



历史

青瓦上的烽火

刘哲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想起了十年前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时,我曾参与全国各省人民出版社共同编撰的《中国抗日战争全景录》(25卷)和《宣传画里的中国抗战》(3卷)的编辑往事,总想写点什么,一直没有缘由。

7月18日,我的大学同学方亚光来合肥,告知我他近几年在家乡歙县五渡村驻村任第一书记,协助党委、政府筹建了抗日女英烈纪念馆。他拿出《五渡三载》和《五渡三馆与五渡影像》两本书出来,当我看到抗战女英烈方璧照片时,此前一个从未听过的名字,就在这个炎炎夏日的静谧夜晚,渐渐地鲜活起来。这个眉眼清秀的徽州女子为什么牺牲在晋中大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为什么给予高度赞扬?亚光同学阔别家乡40余载为什么自愿回去打造红色教育基地呢?难道仅仅是“渐老念乡国”的情怀,还是其他什么样的动因?这个念头和拷问,一直盘桓在我心里,和同学老大莫欣(原安徽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沟通后,他也有这个浓烈的疑问,都想去探寻一下亚光同学“爱得深情的这片土地”,直到今年金秋十月我们终于成行。

10月22日,我们安师大历史系78级合肥同学一行11人,从合肥南站登上开往歙县北的高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将我们毫不费力地抛向黄山市腹地——歙县。方亚光同学早已在歙县北出站口等候,他依旧是旧时模样,只是眉宇间添了些许风霜与沉静。没有过多寒暄的话,只一句“欢迎合肥同学来歙县”。

半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五渡村的排官自然村,亚光径直引我们去了他和同村人倾尽心血筹建的“方璧纪念馆”。这是一座徽式宅院(衍庆堂——方璧出生地),约建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是方璧先祖在排官村建造的两座老宅之一,因大门漆色为褐,位置靠里,俗称“里黑门”。老宅修旧如旧,马头墙依旧高耸,门楼的砖雕依旧繁复,只是那里面供奉的,不再是族谱上的远祖,而是一位为着民族大义献出生命的年轻女儿,她像一把岁月的钥匙,为我们打开了徽州这本厚重史册中,一页被硝烟与血泪浸透的篇章。

纪念馆大厅矗立着方璧烈士铜像,以“八路军文艺战士,晋察冀抗日英雄”14个字总结了她短暂而闪耀的一生,全馆以“出生五渡就学浙沪、教书做工投身革命、奔赴延安抗大学习、模范社员巾帼英雄、青松不语忠魂不朽”五个篇章和“方璧与亲人、方璧与战友、方璧作品、方璧居室和影像”五个专题来展示方璧生

平事迹,还原了她从江南闺秀到铁血战士的蜕变,展示了她在抗战期间平凡而感人的足迹。从中可以感受到作为方氏后人及其乡亲对这位歙县唯一奔赴延安巾帼先辈的缅怀之心和弘扬之意。

建馆以后,亚光有时间就一直义务担当红色引导员、讲解员。当大家循着亚光的事迹陈述,在方璧烈士的一幅幅图片、一件件旧物上停留时,我的目光久久停驻在一张已然泛黄的照片上。那是一个极年轻的八路军女兵,戴着军帽,眉眼清秀,笑意里还带着几分女学生气的文弱。图片下面是她年轻短暂的生平简介:

方璧(1915.7—1942.4.13),原名采琳,别名彩菱,女,歙县五渡村人。1938年5月,奔赴延安,先入抗大二分校,后到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从事文学和戏剧创作,同时兼做演员。先后创作小说《小玲子》、戏剧《街头小景》《一块去》等宣传抗日救国的文艺作品,并在战地演出《日出》等进步剧目。被军区政治部授予“模范社员”光荣称号。受到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高度赞扬。

1942年4月13日,在山西崞县(今原平县)神岗头村执行任务时,被敌包围。突围中,为掩护战友,纵身跳下40米深的沟谷,壮烈牺牲。闻此噩耗,聂荣臻特发唁电哀悼。

方璧这张身着戎装的照片,是她从这粉墙黛瓦的温柔乡里走向烽火连天的北方,将青春与热血献给了那一片她未曾见过的、更为广袤而苦难的土地的历史见证。这时我忽然有一种奇异的联想:这古老的徽州,不仅有以程朱理学、“徽骆驼”精神闻名于世的,其气质仿佛是内向的、沉静的,甚至是有些固执的基因;而且它还存在另一种气质,一副刚烈的、决绝的、面向家国的情怀的赤热。

而今,作为方璧烈士同族侄孙的亚光同学从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退休后,毅然自愿从南京回到家乡,发挥专业特长,挖掘整理巾帼抗战英烈方璧的事迹,远赴山西重走英烈抗战路,查资料整理烈士生平介绍,协助歙县、北岸镇党委、政府修缮其故宅,已经有五年时光了,在方璧故居里不仅建立了方璧纪念馆,还建起了五渡村史馆、汪壁顾准展馆。现已成为歙县政德教育实践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五渡村也因此入选为黄山市直机关基层党组织主题党日活动基地。青瓦上的烽火使“红色五渡”声名远扬,红色遗迹和粉墙黛瓦交相辉映,已构成了一幅墨白徽韵、绿水红村的和美乡村画卷。

行走

寻迹太平坎

胡高兰

从万源玉带的清晨醒来,秋雨如丝如缕。与友人碰面问候,皆道睡得安稳。一来是山上雨后空气清冽如洗,二来是昨日大半天车程颠簸至天黑,确是乏累。踏入太平坎,“天府粮仓太平贡米”几个大字在田间傲然矗立,远处雨后云雾如轻纱般缭绕着群山,仿佛给这片土地蒙上了一层秘境的面纱。

第一站太平坎村史博物馆。一进门,那台古朴的石磨便闯入视线,瞬间勾起我儿时的回忆。听讲解员介绍,这石磨用途甚广,米、麦、豆皆可研磨。而于我,它是童年磨豆浆的记忆载体。儿时看大人推磨,只觉轻松,亲身尝试才知其中门道——推动尚可,转磨却需巧劲,若无足够力量与对转动方位的精准把控,任你如何使力,石磨也纹丝不动。

斗笠、蓑衣静静陈列,这是那时的大人们在雨天劳作的必备物。旁边的笆篓里,似乎还能看见哥哥们为了吓唬我用它装着的泥鳅。漆黑的煤油灯在停电时却是“光明使者”,母亲围灯缝补时,我则在旁写作业;无作业时,父亲会教我“抓火舌”,原来火苗中间温度最低,手速快些抓过竟不烫手,我与父亲轮番尝试,乐在其中。

风车转动,不自觉想起饱满洁净的谷粒从下方倾泻而出,而扇出的瘪谷、谷渣则被分离开来的画面。小时候我总爱在风车旁转圈,跑到尾部扇风,没少被大人呵斥——吹进眼睛的难受劲儿,浑身的瘙痒,让我再也不敢在风车尾部调皮,毕竟“不听大人言,吃亏在眼前”的滋味不好受。在村史博物馆,我们对太平坎的历史文化有了系统的认知:它是贡米之乡,有传统院落、墓葬文化、农耕文化,亦有知名历史人物。虽后来太平县城已动工迁往别处,却在当地人心中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坎”,这“坎”里藏着的是对故土的眷恋,是对历史的铭记。

下一站前往解家大院,途中,讲解员的家令我们驻足。左侧院子青砖黛瓦,古色古香,院墙上的窗户是福字造型,圆润大气;大门顶端两块“光荣之家”的牌匾,彰显着这家人不凡的过往。众人争先恐后地进去一探究竟,竟发现院子里的“古今碰撞”更显趣味:左边是现代大型烤羊肉烤箱,让人感叹这是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家;右边却摆着一台古老的录音机,又将人瞬间拉回了旧时光。鱼池里鲤鱼在荷叶间嬉戏,花坛中茶花、桂花争奇斗艳,墙角红梅与竹枝相映成趣,主人的诗意情怀满溢在这小巧别致的院落里。原来讲解员也姓解,这里亦可称作“解家小院”吧!

经过古墓群落,红军街,终于抵达解家大院,这里是民国参议员解明德的故居。全木结构的建筑,呈台阶式上升,三进,寓意“连升三级”。雨后的青石板路湿滑,我们只得小心翼翼地行走。最有特色的建筑是小天井,形如缩小版的四合院。院内水池“天圆地方”的设计,寓意“肥水不流外人田”,处处透着传统智慧。中午的农家饭也在院中吃。土豆烧鸡、干四季豆炖肉,还有我从未尝过的扎肉,滋味绝美,令人大快朵颐。鼎罐煮的贡米饭香气扑鼻,煮饭的农家大姐非常热情,不停地招呼我们喜欢就多吃点,不够再添,朴实得让人心中一暖。

太平坎的故事太多,虽无法一一记录,但记忆最深的几个场景,已如同一粒粒饱满的贡米,在心底生根发芽,成为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书评

我读小说《乐园鸟》

闫美景

“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两个标准就像经线和纬线,共同度量着小说创作在文学审美价值中的位置。据此,可以发现孙仁歌的小说新作《乐园鸟》(刊发于河北大型文学双月刊《长城》2024年05期)在“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两方面均有其突出的特点。

首先,小说《乐园鸟》“写什么”的方面,是对当下高校教育问题的一种镜像表达。故事的中心情节是,高校创意写作教师廖老师——“鸟爷”怀有理想主义“诗教”育人观和高度教育责任感,认为文学是育人铸魂的最佳手段。他“寓教于乐”,倡导文学阅读和朗诵,培铸学生情感和心灵,转变了“金丝鸟”这个旁人眼中的所谓“问题学生”,支持她参加学校诗歌朗诵比赛。

同时,这篇小说的内容除了现实主义的本色之外,还巧妙融汇了“荒诞”“魔幻”“浪漫主义”等其他色调。其次,小说“怎么写”的方面,体现了对“写什么”的高度适配性。这篇小说的内容如上可概括为教

育现实中的问题,客观来说和很多自带刺激性的小说题材相比,它显得日常、平常,这就愈加需要在“怎么写”方面进行精心设计、“量体裁衣”。

再次,这篇小说的叙述语言上,作者不满足于一般的写实叙述,而是采用了“超现实”的多重叙事语调,融合讽刺批判性、哲理性、诗意化等多重语调,多声部相叠互渗,缭绕应和,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和声式叙述话语系统,彰显了强烈的语言感染力,丰富了文本内容审美意蕴的层次性和纵深度。这些多元的语言调性既与相关的“荒诞”“魔幻”“浪漫”等内容相互应和,也有其独立的审美增值性。

小说《乐园鸟》在“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两条度量创作艺术最重要的经纬线的度量定位下,展现出不凡作品的质地。它根植于作者主体生活土壤,恰当解决了“写什么”的问题,正如巴金所言“作家应写熟悉生活”,又如托尔斯泰再三强调“作者一定要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